

ZENG ZHAOXIN

人性论

● 曾钊新 著

●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人是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有无共同人性？如何按人的方式生活？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要求得对它的答案，必须了解人的本质和人性本身。

本书以探究人性为专论，把理论上被驱逐了的人，又从现实中请回来。

全书设“总论”、“发展”、“关联”、“正身”四篇。《总论篇》回答人性的定义、人性的特征。共同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人性与心理的殊异点；《发展篇》叙述人性理论的历史形态及其科学变革；《关联篇》论证人性与文学、美学、法学、道德、教育的关系；《正身篇》阐明人应该怎样“按人的方式”去生活。

本书文不浪费，言洁意明，适合文学、美学、伦理学、哲学工作者及研究者、爱好者阅读。

序一

傅白芦

人性，是对神性的渎犯，是对善性的抗争。

马克思一八四三年五月在致卢格的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指出它们虽然“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却又“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夜的一九一八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秘密，指出史册上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揭露：“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用任何文字也难以描述的艰苦奋斗，付出了惊震天地的牺牲，终于推翻了“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吃人”的神和善的野蛮统治，斩断了“四条极大的绳索”的残酷束缚，结束了被强制而爬倒、跪下、俯首听命的屈辱生活。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早就传诵着“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著名诗句；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于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以科学的语言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立起来了！”说得多么好！站立起来了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选择，按照《共产党宣言》预示的崇高理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在荆棘丛生的莽原和峻岭间，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开始了铺拓“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联合体”大道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崭新而又艰难的现实，这是中国人民从事前人从未作过的伟大实践。

可是，思想常易落后于现实，理论常易落后于实践。不能觉察这种落后本来就预伏了危机，满足甚至陶醉于这种落后，就势必阻碍实践的进程，而且可能酿成悲剧。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日渐发展；对人的不尊重、不关心、不爱护的现象时有发生，还给一批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其中就有彭德怀、张闻天这样的开国元勋）造成了不幸；乃至对人、人的本质、人生观、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这些与社会主义事业关系至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也难于进行科学的探讨。由是，人性理论的研究，曾在我国学术领域内成为一个禁区，曾为我国学术界人士视作畏途。此种现象发生于矢志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身的人们之中，令人困惑不解。而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腐朽思想，却在这种失误的迷雾里潜滋暗长，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个“史无前例”的时机而赫然出现。在这伙封建法西斯势力肆虐的年代，新的造神运动的喧嚣掩盖着他们的种种绝灭人性的善行，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陷于严重灾难，“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历史丑恶现象复见于新中国的大地。历史的悲剧果真发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正

直的、善良的人们，在痛心疾首之余，莫不对产生此种倒退的多种原因力求得到深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思想解放运动因而兴起。历史的灾难，总是要用历史的进步来作为补偿的。学术界对人性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可以说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对于人性理论，禁止研究是办不到的；拒绝研究是不明智的；光是评说此为荒唐彼属谬误，又并不能代替对它的科学研究。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允许、支持和鼓励对它的探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平等的讨论，再经过生活、实践的检验，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获致科学的成果。舍此别无他途。何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就是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求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处于执政党地位的面临改革开放新形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这都需要我们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所有这些，无不与人、人民、全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割开的联系。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至少是贯穿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的理想目标和基本原则之一，不是是没有根据的。那么，研究人，理应成为学术界的神圣职责之一。

中南工业大学教授、现年五十岁的曾创新同志，多年来从事伦理学、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开始，主要从自己所谙练的学科的角度，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性问题的思想与论述，了解了学术界三十年来关于人性论争的状况，参阅了不少国内和评自国外的有关著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在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了与此有关的论文，并已为学术界所瞩目。五年间，已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共一十六篇，约二十五万字，足见用力之勤；这些论文，分散可以独立成篇，集中则能够凝为一体，现以《人性论》为名结集成书，由此也可看出他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探索创新的勇气。

《人性论》的作者深深知道：“理论上的艰苦和实践上的艰险莫过于对人的研究”。尽管如此，然而，“用理论思维去认识人，才会使人具有理论思维。……认识人，是为着‘按人的方式’生活”，“涤除非人生活的污垢”。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畏艰苦和险阻，努力遵循马克思为人的研究开辟的航道，投身于激流和险滩，去探敲人性理论的大门。科学研究是一个布满着错误和失败的曲折的途程，任何人都不能一次浅尝就获得成功。错误又常常伴随着真理同时出现，即使是真理，如果再朝前一步就可能坠为谬误，即使是谬误，如果调整一下走向也许就可达到真理。在跋涉的途程中，需要的是同志式的切磋和帮助。一座坏了的时钟平稳地躺着不动，它的指针所示，每天总有两个时辰是绝对准确的，但人们决不会把它视为楷模，认作颠扑不破的真理。真理只能在实践中去寻求。曾创新同志怀着对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真诚，进行了多年诚实的探讨，开始了自己的实践，无疑是值得欢迎和称道的。

我不是有名望的闻人，也不是以研究人性理论为职志的专家，只不过是编辑工作者队伍里的一名因年老而退役了的小兵。职业曾要求我必须尽可能多地去寻找常识和知识，历史的灾难更触发了我

对这个既重要又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兴趣。当我有机会在《人性论》问世之前得以拜读全书的时候，职业的习惯曾叫我总想站在它的反方面去进行驳难，可惜自己功底不济；而对它的理论观点作出准确的评价，又感到尚乏工力。好在“文章千古事”，读者的慧眼和专家的卓识，是能够科学地判断出它的得失的。我在拜读之余，深为它的不落窠臼的见解，力求周密的论证，自成体系的结构，流畅清新的文字所吸引；更为它的既不使自己落入“抽象的人性论”泥坑，又避免重陷“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前辙所付出的辛劳而感到欣喜。于是，冒昧地向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提出以下建议：这是我国一位中年学者以一人之力完成的第一本探讨人性理论的专著。关注它的人们将会作出种种不同的评价，而且很可能就某些观点展开论争，然而其学术价值是定将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它是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是值得出版的。如今它问世了，我知道，这不是那个建议起了什么作用，而是《人性论》以其自身的学术价值，赢得了出版社明达诸公的认可。

但这却招来了一樁从来未遇到过的“麻烦”，创新同志执意要我写几句话。盛情难却，于是写了这些。说它是“序”，显然是不够格也不相称的。说它是最早的读者中的一个的读后随想，也许较为恰当一些。

1987年12月

序二

罗国杰

人性问题，是伦理学、哲学、法学、美学等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中外许多伦理思想家、特别是中国的许多伦理思想家，对人性问题，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过种种看法，不断补充和丰富了有关道德理想、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理论，从而使中国伦理思想显示出独有的民族特色，这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中外许多有关人性的理论，尽管在不断的探索中，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但是，都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把人性当作一个科学概念在理论上予以正确的阐发。

建国后，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革命年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人性问题，曾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禁区。首先是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这就在实质上否认了人的社会性，否认了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所具有的共同的本性。确实，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的人性中，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都带上了阶级性；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除了阶级性以外，就没有共同的人性。如果不承认有共同人性，那么阶级性的烙印又打在什么地方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不承认物的本身，这烙印又何以存在？既然阶级性只是在阶级社会中打在共同人性上的烙印，那么，除了烙印之外，这种共同人性必然是应该而且值得我们研究的。因此，把具有社会性的共同人

性完全等同于阶级性的说法，应当说是不确切的，不科学的。这种看法，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好的后果。其次是，把一切有关人性的理论，都冠之以抽象人性论的帽子，也是不正确的。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思想家们，由于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性看作是一种超越历史发展、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因此，陷入一种非科学的抽象。但是，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发展上，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来分析人性，即从经济、政治关系的制约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要求中；从不同生活环境中人的需要欲望和感情中来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的共同本性，这不但不是抽象地研究人性，而且正是历史地、具体地、科学地研究人性。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从伦理学这一具体科学来说，它在探索道德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上（如道德理想、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等），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的共同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在人性的研究上取得进展，也必将会影响伦理学自身的学科建设。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为了培养人的品质，在人性论的研究上，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我们更应当注意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再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人性论，都归结为一种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是不确切的。确实，从某一种理论的提出者来说，他们都必然处在一定社会的一定阶级中，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因而他们的理论，当然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或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但是，也有小生产者的人性论，也有很难归属于那一个阶级的人性论（如告子的人性论）等等。更重要的是，在人性的各种理论上，使它们相区别的还有其各自不同的重要论点，如自然本性说、天赋人性说、先验人性说、社会属性说等等。因此，在承认有关人性的理论，归根到底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要从这些理论中探索

它们之间的分歧，掌握它们在相互驳难中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从而使我们对历史上的人性理论能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提供借鉴和启示。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对于有关人性论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艰苦的研究，并作出科学的分析，在当前来说，是一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应当而且能够从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关于人性理论的反思中，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曾创新同志多年来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性问题的有关论述，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有关人性论的各方面的问题，对加强伦理学的理论建设，对进一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作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有较广博的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知识，有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因此本书确实克服了过去长时期所形成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在有关人性的理论上，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只要能仔细阅读本书，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同意我这个看法的。

当然，作者的有些论点，有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有些看法，可能会引起争论。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述了“道德产生于经济生活之中，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产生道德的客观基础，这是究其最终根底说的”，同时强调了“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位原因或第二位基地”。可能是为了纠正和克服过去关于经济状况决定道德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倾向，作者主要论述了“人性作为产生道德的第二位原因或第二位基地”的各种理由，因而使我们感到，对第一原因或第一位基地的论述不够，甚至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常常是螺旋形而不是直线的。

理论的发展，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段时期内，在“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教条主义，唯书、唯上的思想，曾经阻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现在，随着思想解放日益深入，随着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禁区的打破，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必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当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于创新，勇于开拓和勇于探索，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才能在理论上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和进入新境界。在这种创新、开拓和探索中，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不但是正常的、允许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一种新观点，在最初提出时，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实事求是地评论和探讨，同志式地批评和争辩，往往是理论上互补的一种重要方式。人性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真理愈辩愈明”，对于人性这样一个特别复杂的理论问题，只有进行长期地、客观地、细致地、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由于“大批判”的流毒，在我国学术理论界，直到今天，似乎还仍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为真理而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条件，没有形成理论繁荣所必需的氛围。学术理论的发展，必须经过学术界的学术讨论，由学术界来解决，希望用行政命令、用领导意图来支持一种学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也往往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努力创造这样一种在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环境，创造理论繁荣所必需的条件，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力，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我们应当为此努力。

《人性论》一书，是曾创新同志最近几年来所写的有关人性问题的论文的文集。去年年底，他将稿子寄我，请我为这本书写序。最近一段时期，由于行政工作较忙，直到最近，才读完了这本书。我对曾创新同志的这种可贵的探索和达到的理论成就，感到高兴，

序三

臧乐源

我比钊新大几岁，但属于同代人。为他的书作序，实在不敢当。抱着学习的态度，读了《人性论》，受到不少启迪，现在把几点学习体会写在下面。

首先，这本书涉及到人性的各个方面，内容很丰富，领域很宽广。从人性的定义、作用、内容和特点，人性理论的历史发展，人性与上层建筑一些因素的关系，人性在正身中的作用等等，都作了有益的探讨。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没有渊博的学识是驾驭不了的。本书从基本理论阐述，到历史分析，到实际运用，一层层展开，有着严密的内在结构，使读者很自然地一步步登上“人性王国”的科学殿堂。

其次，本书立论新颖。我很佩服钊新的理论勇气，在许多问题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例如，人们通常讲，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如果谁讲“共同人性”，就会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大帽子。钊新敢于冲破这个禁区，鲜明地提出“在阶级社会中共同人性是存在的”论断，并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的确如作者所讲的，在“阶级斗争的风暴浪潮中有人性的川动”，也的确如作者所讲的“道德的继承性能在人类的共同性中找到真谛”。人类如果没有共同性，道德如果没有共同性，道德的继承性将从何谈起？人类的共同性，道德的共同性是道德继承性的理论前提。只承认道

德的继承性，否认道德的共同性，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第三，本书对不少问题的分析，相当精辟。《论人性的唯一性和一维性》一章中指出：“人性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社会动物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观念的一般凝聚和结晶，是社会意识的总和。……因此，它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总特征，它不应当包括人和动物同具的自然属性。”又指出：“我们所讨论的人性不是人的天生的自然本性，而是真正的人的一般性质。这种性质使人和动物相区别，也使人与非人相区别。这就是真正的人的社会性，即作为社会动物所具有的共性。因此，我们才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人性，是构成真正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书中的这些话，不仅十分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关于人性的见解，而且从理论上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的观点，并且从系统论上阐明了人性不属于自然动物系统，也不是社会动物系统的全部，而是社会动物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分析是层次分明的，相当深刻的。

最后，我还感到这本书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研究人性，是为了揭开“四人帮”在人性问题上笼罩的种种迷雾，还其本来面目，是为了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为了造成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当然，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在举例和论述上有某些重复，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加深论述。尽管如此，《人性论》仍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立论新颖，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的学术专著。

1988年元旦于济南山东大学

序四

唐凯麟

曾钊新同志的《人性论》一书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我极乐意在此谈点粗浅的认识。

人的问题是哲学中一个常设常新的问题。只要生活在前进，思想在运转，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要提到人们的面前，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生活处于急剧变化，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历史主动性的转折关头，情况会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起来。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深入，正在以新的高度提出了从理论上认识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的任务，提出了必须研究和确定人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人的愿望和生活宗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解答，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关于人的探讨的热潮。但是，在这股热潮中，无论是属于主观主义的哲学流派还是属于客观主义的哲学流派，他们关于人的学说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对立、科学的因素和价值的因素相分裂为共同特征的。主观主义哲学流派赋予主体以首要的意义，他们断言：哲学如果要想成为解决人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的有效工具，就应当是“人的哲学”或“哲学人类学”。由此，他们把哲学仅仅看成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和理解的一种特定的形式，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而人则成了某种不能客观化的、非物质的东西，成了某种不能用科学概念规定下来的独立、自由创造的本原。与此相反，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客观主义流

派则赋予客体以首要的意义，他们断言：哲学应当首先是世界的哲学，而人就其自身的存在来说，不过是世界的存在的一部分，应当把人作为同其他有同等价值的领域同时存在的一个领域。由此，他们把哲学仅仅看作是专门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人只不过是这种知识的客体，是完全依赖不同于人、离开人的客观领域的。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关于人的理论的这种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对立、科学的因素和价值的因素相互分裂的反科学性质，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物的方面和人的方面的矛盾，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人的精神的、道德危机的日益加深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对人的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本身就包含着实现社会的改造和人的自身解放的崇高的价值目标。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他又说：“工人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宣传中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30页）探讨人的本质、人的命运和人的理想，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重心。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则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研究的开始。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更进一步把人的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阐明了个人价值同社会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中客观的因素和主观的因素、科学的因素和价值的因素的辩证统一，为对人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认识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哲学理论既应当对人的本质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作出一般的理论解释，又应当确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准则；既要注意客体的外部世界，又要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真正揭示人在社会生活

中的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不仅如此，哲学还应当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理解关于人的各种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并借助于这些成果来阐明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特征。这就是马克思所开辟的研究人的科学航道。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和把握真理的道路。在研究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我以为曾创新同志的《人性论》一书，就是循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书中关于人的本性的各种见解到底具有多少真实性，这是一个需要开展学术争鸣的问题。但作者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关于人的客观的因素和主观的因素、科学的因素和价值的因素统一起来，并十分注意从理论上概括当代各门学科关于人的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从作者的大胆的探索中，我们看到一种强烈的愿望：关于人的理论研究这块阵地，不能再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独占，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在这种阵地上升起自己的旗帜。

长期以来，谈人色变这种极不正常的心理，一直象恶梦一样纠缠着人们，它力图使人相信：人的问题已经穷尽了，剩下的任务只是重复已有的真理。尽管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出自己新的本质，尽管生活本身一次又一次地把人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然而研究人的这块理论园地却荆棘丛生，人们不得不望而却步。以致在一些人中间，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中间，误解在与日俱增：似乎马克思忽视了人，不像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那样关注人，殊不知正是马克思才真正揭穿了“人”这个司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把人的本质还给了人。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它深刻地告诉我们，研究人、依据现代生活的实际经验和科学发展的具体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是何等重要！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同样必须创造一个自由探讨的良好环境。如果我们老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无休止地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怀着谅解的心

情来看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百次、一千次的失误，而却不允许关于人的学术探讨有半点差池，那么不管是出自何等良好的愿望，其结果只能是“权力真理论”的重新抬头。而一旦权力的棒槌在学术领域里划定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之际，那也正是谬误得意忘形之时。这方面的事情还少吗？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为曾钊新同志的《人性论》一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以为这是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著作。我相信读者会从这本著作中看到关于人的理论的严肃探讨和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既然是一本学术著作，那么见仁见智，对于书中的某些观点，也许读者同作者之间会有某种认识上的差异，但是我以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学术著作的真正价值，不止是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真理性的认识，还在它能否启迪人们的思维，有利于促进问题的深入。有差异就需要互补，有互补则会产生合作。有五音互补才有好的乐曲，有五味互补才有好的膳食，有五官互补才有好的面孔，有众智互补才有好的主意，有众论互补才有好的学问。生活需要七色阳光，学术需要百家争鸣。在我们这个改革的年代，迫切需要改革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已有真理的教条式的重复，而是力图推进真理，着意创新。如果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改革实践，理论的指导功能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那么当理论工作者力图打破这种局面，迈出最初的步伐时，我们大可不必站出来阻止说：不行！你要下水，先得学好游泳。我以为这至少是一种轻率态度。

1988年3月28日写于湖南师大